

科技创新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探析

■ 王倩

一、利用科技创新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性

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一关键核心驱动力量,科技创新已然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包括5G通信、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等)在农村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方面,通过5G网络部署和大数据技术集成,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升级,为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动力支撑。与此同时,多元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持续涌现。这些制度性载体不仅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更为科技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系统化支撑平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各类经营主体对科技创新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应用科技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愿显著增强。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科技赋能乡村发展的市场需求基础,为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

二、科技创新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1.科技供给不足
针对农业核心技术领域,我国在此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内部科技供给能力均有待提升。当前,我国农业技术主要依赖于国外,在一些农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以畜禽遗传育种为例,其核心种源约80%依赖进口。在农业科研投入强度方面,美国、德国、荷兰等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为1.9%,我国仅为0.71%,远不及世界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

2.科技人才匮乏
农业科技人才结构性匮乏问题突出,多元化科技人才、高层次复合型科技人才供给不足。一些地区的农业科技人才缺乏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制度,造成部分科技人才缺乏解决农业专业问题的核心素养与能力,进而拖累农业发展的整体进度。科技人才的结构性匮乏会造成乡村全面振兴规划缺乏科学性与前瞻性考量,从而无法及时解决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3.“数字鸿沟”显现

我国乡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城市较为薄弱,村民对数字建设的参与度不高。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7.9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1.8%;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8.2%;农村网民规模仅占城镇网民规模的39.3%。此外,我国农村村民的整体数字素养欠缺;一方面表现为在面对虚假信息与低俗内容时,部分人群缺乏辨识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自律性不足,部分人群存在沉迷线上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的现象。这致使互联网平台在知识学习、商业经营、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多元化功能未能得到有效释放与充分利用。

三、科技创新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1.加强科技创新供给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地区的科技需求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特征,不仅在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对技术升级有需求,还在乡村治理、生态保护、产业融合等新兴领域展现出技术创新的诉求。满足这些需求需构建政府引

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协同机制,重点在于提升科技供给强度,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科技服务体系、优化科技政策和加大资金支持,并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社会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确保农业领域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2.培育乡村科技人才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在乡村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要多维度协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重点培育和大力支持科技人才队伍,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优质科技人才资源向乡村空间集聚;另一方面,可依托“青鸟计划”等人才项目,吸引高校学子利用假期返乡参与社会实践,为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在人才流动与配置层面,应建立科技人员下乡服务常态化机制,既要鼓励农民工群体返乡创业创新,又要加大农业科技领军人才的引进力度。多元主体参与与不断强化了人才支撑,为农业科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夯实了人才保障基础,还通过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最

终形成以人才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范式。

3.夯实数字化建设基础
一方面,我们应进一步加快乡村宽带网络、5G基站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电网改造,确保网络覆盖到村到户与数字设备的稳定运行,为数字化应用提供硬件支持。同时,搭建乡村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农业技术咨询、电商销售、物流配送等服务,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销售中的实际问题,促进农产品流通。另一方面,提高乡村村民数字素养。有效发挥乡村村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乡村村民参与数字建设的积极性,使其融入数字化生活。同时,要加大基层政府干部与乡村本土人才的数字技能培训力度,充分释放其示范引领效能。此外,针对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等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薄弱环节开展精准化、个性化的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加强企业基层党建系统化管理的分析

■ 张禹

引言
基层党建工作是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系到企业自身稳定和发展的的重要因素。当前,企业基层党建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基于此,本文根据企业内部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先阐述企业基层党建管理面临的困境,再探讨加强企业基层党建系统化管理的策略,以期对企业基层党建工作实践有所裨益。

一、企业基层党建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不足

企业基层党建工作有时脱离了业务工作。一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工作纯粹看作是政治工作,没有充分意识到党建引领业务的作用。未结合业务工作目标和需要来制订党建工作计划,造成党建活动与业务工作“两张皮”。例如,党建工作不能及时为项目推进提供思想动力和组织保障,未能在业务中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业务部门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认为党建工作会占用业务时间,对党建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阻碍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效果。

(二)党建工作队伍能力有待提升

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队伍能力素质参差不齐。一方面,有些基层党务工作者对党建理论和政策法规掌握不深,开展党建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还有部分党务工作者从业务岗位转岗而来,未经过专业党建培训,不熟悉党建工作流程和方法。另一方面,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建工作重视程度也弱于业务工作,导致党建工作队伍的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吸引优秀

人才加入。同时,基层党务工作者工作任务繁重,既要担负日常党建工作又要兼顾部分业务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提高自身能力。

(三)党建工作方式方法陈旧

企业基层党建工作方式方法比较传统。在组织活动方面,多数以会议领导宣读、学习传达、讲解政策为主,形式单调,毫无吸引力与感染力,党员被动接受,互动和交流不足,难以激发党员的参与热情。在教育管理上,对党员的教育偏重于理论学习,缺乏实践锻炼和针对性。针对年轻党员,没有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需求创新教育方式,导致教育效果不佳。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党建工作方面滞后,没有发挥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的优势。

(四)党建工作考核机制不完善

企业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机制存在缺陷。首先,考核指标不够细化和量化。考核对党建工作的评价多以定性为主,缺少具体的数据支撑。以党组织的工作成效考核为例,通常只是看开展了多少活动以及召开了多少次会议,而对于活动的质量和效果没有深入评估。同时,考核结果与党务工作者的绩效、晋升等挂钩不紧,致使党务工作者对考核不够重视,工作积极性不高;其次,考核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发现问题不能及时整改,影响了党建工作的不断改进。

二、加强企业基层党建系统化管理的策略

(一)构建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工作体系

企业基层党组织需构建一套健全的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工作体系。一方面,党组织应主动了解业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制定党建工作计划时,将业务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党建任务。例如,在具体工作中,党组织可以建立党

员责任区,党员承担相应工作,把党建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业务环节。同时,业务部门要在制定业务计划中充分考虑党建工作的要求,使党建工作融入业务流程。例如,在项目招标投标阶段,根据党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优先选用党员骨干进行项目投标。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建立党建与业务的联合工作机制,促进党建与业务的融合。通过定期召开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研讨会,党组织和业务部门共同探讨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从而让党建工作为业务工作提供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业务工作为党建工作提供实践平台和检验标准,实现党建与业务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二)打造高素质的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队伍

要想打造高素质基层党建工作队伍,需要企业采取多种举措。其一,加强对现有党务工作者的培训教育。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涉及党建理论、政策法规、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聘请高校专家学者、上级党组织的党务工作者来企业授课,传授先进党建工作经验和方法;同时,组织党务工作者参加各种党建培训课程和研讨会,扩大视野和知识面。其二,完善党建工作队伍的选聘机制。在企业内部选拔一些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有责任心的人员充实到党建工作队伍中。对新进员工,设立党建工作岗位的实习机会,使其在实践中了解党建工作,培养党建工作的兴趣与能力。此外,企业要为党建工作队伍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把党务工作者的工作业绩和薪酬、晋升挂钩,提高党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

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需要创新方式方法,以

期提高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在组织活动方面,党组织可以开展不同主题的党日活动。除传统的参观学习、志愿服务活动等外,还应该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技术创新竞赛、岗位练兵等活动,让党员在活动中提升业务能力,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在党员教育管理上,要体现个性化与差异化。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岗位的党员,制定对应的教育方案。对于年轻党员,需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开展线上党课、微视频学习等活动,满足其学习需求。至于业务岗位的党员,可以按照其工作实际,实施案例教学,使他们通过实际工作学习党建知识,提高党性修养。此外,企业自身也需建设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对党员学习、工作、参加组织活动等情况予以量化考核,激励党员主动参加党建工作。

(四)完善基层党建工作的考核机制

提高企业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机制是不可或缺的。首先,细化和量化考核指标。在党建工作的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都要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明确每一个指标的权重和评分标准。例如,在党建工作的组织建设方面,可以考核党组织的换届选举是否按时进行、党组织的班子结构是否合理等;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可以考核党员的学习培训情况、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情况等。其次,加强考核结果的运用。将考核结果与党务工作者的绩效、晋升、奖励等挂钩。对考核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予以表彰奖励,在晋升、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对考核不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进行谈话提醒,督促其整改。同时,建立考核反馈机制,及时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使他们知道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以便

立即改进。

(五)推进企业文化与党建文化的融合发展

企业要推进企业文化与党建文化的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第一,党组织应深入挖掘企业文化与党建文化的内涵,找出两者的契合点。例如,企业文化中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与党建文化中的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是一致的。首先,通过开展文化活动,设立党建文化展示区,将企业的党建工作成果、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进行展示,将党建文化融入企业文化,让员工在文化活动中了解党建文化,增强党建工作的认同感。其次,企业需利用企业文化传播渠道宣传党建文化。刊发党建文化方面的文章和信息,通过企业内部刊物、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让员工随时随地都能学习党建文化。

第二,企业可以将党建文化的要求加入企业的规章制度中,让员工在日常工作时自觉践行党建文化,实现企业文化与党建文化的深度融合,为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基层党建系统化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为应对当前企业基层党建管理工作存在的困境,可以通过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提升工作队伍素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完善考核机制以及加强文化融合等举措进行解决。只有不断优化基层党建工作,才能发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的作用,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作者单位: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时代内涵

■ 李雪 马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24日回信勉励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的后代。他在信中指出1951年各族代表立碑盟誓的历史事件,并强调70多年来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不仅是对民族团结誓词碑历史意义的肯定,更是对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斗”精神的高度赞扬。

一、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历史渊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复

杂,经济发展迟滞,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党中央及云南省委坚持“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派出访问团、工作队到民族地区“做好事、交朋友”,实施“和平协商土改”“直接过渡”等政策,引导边疆各族群众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增进边疆人民对内地的了解和民族团结,中央决定从各地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1950年9月,云南普洱区选派了43名各族代表和工作人员赴京观礼。各民族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同年12月27日,各民族代表返回云南后立即召开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来自26个民族的头人、首领和党政军领导共300余人参会。1951年元旦,3000多名各族群众在宁洱红场举行隆重的盟誓大会。48名代表在碑上用傣文、拉祜文和汉文签下名字,庄严宣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郑重地于此举行了割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民族团结誓词碑就此诞生。

二、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时代内涵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成功实践的关键见证,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其一,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各族人民通过盟誓立碑,表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自上而下的民族政策引导与组织实施,为民族团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其二,民族团结誓词碑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典范。通过“歃血为盟”这种源远流长的民族传

统文化,为民族团结提供坚实的内在动力。自下而上的盟誓铸魂,通过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与凝聚力,激发各族群众的内在动力。其三,民族团结誓词碑以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生动诠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展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伟大实践。从最初的“顾虑”到后来“一心向党”,民族代表决心“跟党走”,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作者单位:李雪,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云南工商学院;马腾,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对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价值意义

■ 傅羚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在全国范围推行水资源费改税,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首个落地实施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任务。基于此,本文梳理了我国水资源费改税实施以来的改革历程并分析了此次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全面实施的特点,探讨了其全面实施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以及构建绿色发展社会共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积极意义。

一、水资源费改税全面实施的历程与特点

水资源费改税是将传统按量征收的水资源费改为征收水资源税的改革措施,旨在通过税收杠杆加强水资源保护,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原有行政性收费,实施差别化税率,将水资源税收纳入法律框架管理,以抑制水资源过度开采,促进节约用水和生态保护。

我国水资源费改税历程主要包括两个阶段(试点阶段、全面实施):2016年7月,河北省率先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随后试点范围

扩大至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宁夏等九省(区、市),重点解决水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经过8年探索,2024年10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从2024年12月1日起,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将在十省(区、市)开展的基础上推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至此水资源费改税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此次水资源费改税全面实施的显著特点,主要包括:

1.地方自主权显著增大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授权各地区人民政府在所附规定的最低平均税额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灵活制定具体税额和减免税项目。这一机制既守住全国统一的水资源保护底线,又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差异,避免政策僵化。通过“基础标准+地方调节”的模式,在保障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让税收政策更好适配区域特点,既约束过度开发又引导税收资金反哺生态治理,促进水资源管理更加科学、可持续。

2.水资源税收制度精细化
精细化体现于对水资源使用的多维度调控与精准管理。在设定差异化税率方面,对取用地下水从高确定税额,同时针对特种行业如洗车、高尔夫球场,设定高税率,以强化对高耗水行为的约束;而对疏干排水回收等生态友好型用水实施低税率,鼓励资源循环利用。在减免税方面,兼顾公众利益,对家庭零星用水、农村集体取水等完全免税,同时对工业用水效率达标企业减税20%,既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又推动节水技术进步。

3.加强跨部门协同融合

通过数据共享和部门联动,将水资源保护与监督治理相结合。水行政部门提供企业取水许可、计量数据等信息,税务机关核验企业申报,发现异常立即联合核查,及时调整应纳税额,将水资源监管与税收征管无缝衔接,还通过技术手段强化监管的精准性与透明度,既防止虚报漏税,又保障了水资源保护政策的有效落地。

二、水资源费改税全面实施对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意义

当前,我国在水资源领域存在着水资源总

量大、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水环境容量小、水生态功能脆弱等突出问题。水资源费改税是党中央统筹水资源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其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微观层面,水资源税能够通过差别化税收优惠,鼓励高耗水企业优化生产工艺,加速淘汰高耗落后产能,推动节水技术研发与应用;中观层面,税收的调节作用造成的成本差异,能够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低耗水、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形成产业结构动态调整的良性机制;宏观层面,税收政策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可矫正传统粗放发展模式下的资源错配问题。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系统性提升,本质上重构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耦合关系,为绿色转型奠定基础。

2.完善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现行水费体系难以充分体现水资源的生态价值,也无法有效解决资源短缺的负外部性问题。通过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可以将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显性化,形成贯穿生产消费

全流程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一机制不仅能强化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更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社会形成节水型生产消费模式。同时,借助水资源税信息平台的实时监测数据,政府可动态调整税率级差和用水配额,实现数字化管控,将数字税收融入环境治理体系,促使生态保护从行政强制转变为利益相关方的自觉行动,有利于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现代绿色发展治理新格局。

3.构建绿色发展社会共识

水资源费改税的全面实施具有显著的价值观引导功能,有利于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实践,推动全社会形成对绿色发展的价值认同。税收的“固定性”特征,即通过法律形式强化了水资源有偿使用的社会认知,使节水意识成为权利义务对等的公民责任。这种价值观共识的凝聚不仅消解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对立排斥,更催生出全民参与与生态治理共同体,为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提供深层文化支撑和持久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